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2.001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郭学文

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给国家海洋安全、海洋法治及其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更迫切的需求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大的挑战。海洋“国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依法治海是国家主权应有之义,国家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六度”框架(思想高度、认识角度、价值尺度、经验厚度、问题精度、创新维度)为核心,系统论述了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导向、经验借鉴与AI赋能、实施路径与机制创新、长效机制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安全;海洋法治;文化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2-0001-06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旨在科学地定性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为新时代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国际环境逻辑依据和国际背景因素依据。近年来,大变局加速演进,体现为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加速,表现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性、动荡性加剧等特征。这给国家海洋安全、海洋法治及其海洋文化管理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以下从思想高度、认识角度、价值尺度、经验厚度、问题精度、创新维度“六度”方面论述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路径和机制。

一、思想高度:从党的创新理论高度认识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理论价值

在法治社会中,海洋文化必然带有法治的印记。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必然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新时代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建设的。加强海洋法治建设理论研究,有利于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理论支撑。2025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31周年,正是基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深入理论研究,我国在2006年根据公约的规定,提交了一项富有远见卓识的排除性声明,郑重表示不接受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领土争端,不接受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2013年菲律宾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时,我国的该声明在国际社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说理作用。

当然,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研究及其实践,也有助于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和贯彻力度,进而有助于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加强海洋法治理论体系研究,为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究、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有助于促进交叉融合学科理论研究进步,海洋法治文化研究涉及法学、国家安全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属于新文科中的新兴交叉融合领域,甚至是跨文理科的交叉融合领域。

二、认识角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安全,涉及的领域和类型十分丰富,其中就包括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海洋安全既是国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事关我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国家安全。海洋国土作为蓝色国土,是我国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蓝色国土上的资源和能源是我国资源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海洋安全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25-01-20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重点课题“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中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研究”(SDGJ2023B23)

作者简介:郭学文(1967—),男,山东招远人,法学硕士,鲁东大学盈科法学院教授。

从现实意义上来分析,海洋文化建设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有助于通过加强海洋执法、司法和立法力度,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打击海洋违法行为,维护我国的海上通道安全。第二,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维护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和平,通过加强跨国海洋合作、沟通和交流,促进海洋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共同应对海洋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维护和完善国际海洋秩序。第三,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提升公民海洋法治意识,特别是通过加强海洋法治文化宣传教育,普及海洋法治知识,使公民提高海洋法治观念、增强海洋法治意识,使得依法护海、养海、用海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规范和自觉行动。第四,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海洋法治文化建设为海洋经济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通过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安全,预防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规范海洋经济活动,推动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五,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海洋强国、强省、强市事业的发展,通过保护我国的海洋国家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有助于“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形式演绎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活话剧”^[1],为烟台市、山东省和国家的海洋事业发展创造持久稳定的、规范有序的法治文化环境,讲好新时代的海洋法治文化故事,例如2024年6月,烟台黄渤海新区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海洋法治文化宣传活动^[2]。第六,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在海洋权益保护中发展海洋法治文化,维护国家安全。由于海洋是国际交通运输的通道、自然资源的重要产地,一个海岛的价值远远不止海岛本身,还包括围绕在海岛周围12海里的领海、12海里的毗连区、二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位于海面下的大陆架,仅该范围内的经济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这还不算该范围内的军事价值,因此海洋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博弈的新棋枰、新战略战术要地;海洋权益不仅仅是普通的权利和利益,远洋捕捞等海洋权益保护涉及海外利益保护。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曾经批判过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提出所有权利都有被侵犯、被冒犯的危

险,所有权利都是在斗争中形成和维护的;无论是国家的海洋权,还是我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海洋权益,都是需要依法维护的,海洋维权实践是海洋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海洋法治就是在国家和国人的海洋权益保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价值尺度:通过“守正创新”在海洋法治环境建设中守护核心价值

在当前这一新时期,海洋法治文化建设与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海洋法治文化是海洋文化与法治文化的交叉篇,海洋法治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现路径之一。“未来研究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关注具体实践问题研究”^[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全面的、长期的指导思想,理所当然地应当贯彻落实到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方面。新时代法治思想在海洋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落实,既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11个核心要义的落实,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中的主体性作用等;还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方法的落实,例如正确处理海洋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甚至国家安全的关系、涉外海洋政治军事斗争和法治斗争的关系、海洋文化建设改革创新和海洋法治建设的关系等。

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对于海洋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首先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引领。加强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首重构建良好的海洋法治环境,通过国内和涉外两方面的“良法”和“善治”,在国外、国内确立起维护我国国家海洋主权、有效进行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维护海洋法律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法治底线和法治红线,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海洋法治建设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对外共同守护和平、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内共同守护文明、和谐、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经验厚度:从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成就中总结科学经验

我国海洋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萌芽阶段。海洋法治建设成就,主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籍船舶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4年)等,构建了船舶管理、领海保护、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制基础。第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比较重要的海洋法治建设成就,主要有: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1983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年)、《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985年)、《渔业法》(1986年)等,大大加强了海洋环境整体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法制建设。第三,新时代开始之前的基本成型阶段。这段时间,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海洋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发布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年);制定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海岛保护法》(2009年)、《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9年)等,基本上构建了海洋法律制度方面的四梁八柱。第四,是新时代开始之后至今的全面、快速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我国开始了海洋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4]海洋法治建设成就,主要有:加入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2014年批准);制定了《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2016年)、《海警法》(2021年);发布了《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声明》(2016年),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4年);在南海进行生态环境执法、在东海进行钓鱼岛巡航等。这些均属于海洋法治建设和实施范畴的成就。

以上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海洋法治建设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之后更有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第二,海洋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得当,海洋方面法的制定的科学化、法的实施的严格公正、法的监督和保障的有力。第三,广大公民对海洋法律制度遵法守规的意识明显增强,民众海洋法治信仰正在逐步形成等;而民众的海洋法治信仰,又能动地反推着海洋法治建设的发展。这些科学经验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

五、问题精度:“以问题为中心”进一步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根据我国当前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应“以问题为中心”,积极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路径。

首先,应当积极应对海洋国土安全挑战,早日制定“海洋基本法”。当前,我国的海洋国土安全仍然面临挑战。在海洋国土安全方面,面临南海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岛礁蛮横无理、无中生有的所谓权益挑战;南海区域某些国家将破旧军舰在我国岛礁非法坐滩所带来的对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或国家团伙军舰、飞机在南海挑起的所谓航行自由问题;某些国家渔民的非法行为对中国在南海诸岛休渔制度带来的挑战等。建议我国借鉴加拿大的《海洋法》(1997年)、美国的《海洋法案》(2000年)、日本的《海洋基本法》(2007年)、越南的《海洋法》(2012年)、印度尼西亚的《海洋法》(2014年),制定自己基本性的、综合性的“海洋基本法”。

其次,应当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议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协同执法。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挑战主要有:某些周边国家军舰非法“坐滩”对我国南海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某些周边国家进行核废水排海所带来的核污染问题;某些周边国家对我国钓鱼岛等岛屿主权及其领海主权的侵犯等。海洋协同执法机制的建设任务,包括完善常态化多部门海洋协同执法机制、完善海洋法治监督和保障法律规范体系、完善海洋法治宣传教育平台和机制等。建议我国完善海警、海事、海综、边检、打私等部门的协同执法、协同监督机制,进一步破解“九龙治海”所带来的、实效上的难题。这些问题和任务,必将随着中国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等协同执法、协同监督机制的完备,而得到解决和完成。

最后,积极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内涵和目标维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海洋安全问题。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在海洋方面的体现,一般来说,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国家安全的内容,在海洋安全中都有所包括。对我国目前而言,国家海洋安全主要体现为:海洋国土安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安全、海洋核安

全等。这些主要方面就是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内涵和目标。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是坚持贯彻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坚持系统化构建相关法治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我国海洋权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等。良好的法律制度不会像植物的种子自己发芽一样产生,而需要优秀的立法工作者予以立、改、废;好的法律制度产生之后,也不会像所谓的永动机一样自己运行,而需要公正的执法者、司法者予以奉法而行;有了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司法机制之后,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良好的守法意识,形成稳定的守法习惯。我国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因此加强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等。

六、创新维度:以适应理念和“动态系统理论”完善海洋法治建设机制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重在以“适应理念”、根据“动态系统理论”完善海洋法治主体的行为。“适应理念通过修正落后且明显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约束不合时宜的利益主张,以符合人类理性在新情势下的新判断,催生具有进步性的规则”^[5]。

(一)完善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在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方面,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行为规范体系。海洋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海洋的全部文化财富的总和。其中,海港、码头、船舶等属于海洋物质文化范畴;起源于我国宋代、至今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妈祖信仰等属于海洋精神文化范畴;当代作家赵德发的《大海风》等属于海洋文学范畴;尊重海洋法律制度、维护海洋法律制度权威的行为属于海洋法治行为文化范畴。总之,海洋法治文化内涵的丰富,包括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和思维、法治规范及其实施、法治监督和保障等核心要素。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完善其所包含的法治价值观体系和价值规范体系。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以法治手段保护和约束海洋行为、维护海洋国土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制止海洋违法行为、维护海洋秩序、推动海洋经济的工作

发展。新时代海洋法治价值体系,是通过完善的海洋行为规范体系表现和归纳总结出来的,主要体现为:第一,新时代文化和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第二,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第四,自中国古代和近代流传下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性、向近海求富的民生性、向远洋求学的开放性、依法护海保国的爱国性等海洋文化特色。新时代海洋行为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良法”——及时地、科学地立法的制定模式;“善治”——严格地、文明地执法,依法护岛、护礁、护海、用海、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法的实施模式等。

(二)完善“良法”“善治”相结合的海洋法治规范体系

法治文化建设创新的过程,就是为了应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新任务,而制定新法规;采取新方式、新方法、新平台、新的应对策略;及其长效机制建设。这种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方面的适度的调整,应当是一个常态的、无休止的过程,直到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为止,这就是达到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最优”^[6];而且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的、非线性的过程——也就是应当具有物理学和生物学上所说的“耗散结构”功能^[7],以及协同的、引进先进生产力的过程。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在海洋方面的体现,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国家安全类型中的绝大多数,在海洋安全中都多多少少有所包括。对我国目前而言,国家海洋安全主要体现为:海洋国土安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安全、海洋核安全等。这些主要方面就是我国海洋法治建设的重点内涵和目标。海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完善其所包含的法治价值观体系 and 行为规范体系。海洋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以法治手段保护和约束海洋行为、维护海洋国土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制止海洋违法行为、维护海洋秩序。通过完善法的立、改、废的科学化,以及严格公正、执法司法的实践,为全社会提供制度化海洋法治供给;积极参加“国际海洋造法”。坚持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相协调,其中“涉外法治的主体工程是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8]。

(三)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海洋法治建设主体机制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海洋法治建设。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人民至上”,做到海洋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依法维护人民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海洋权益。第二,加强人才队伍领域的长效机制建设。培育海洋法治建设队伍,为推动海洋法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法治建设归根到底要靠人来落实,优秀的法治建设队伍是海洋法治建设成功的人才队伍保障。第三,加强关键主体方面的长效机制建设。发挥法律制度和以案说法的教育作用,教育、引导、影响公民遵法守法,特别是要抓住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两个关键群体,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用海洋法治体系校准自己的理念、校正自己的行动。

(四)完善“数智赋能”“弘扬”与“借鉴”相结合的守正创新机制

第一,应当加强“数智赋能”的海洋法治宣传普及工作。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在数字化时代建设完善海洋法治网络平台,为推动海洋法治建设提供“新基建”支持,遵循数字时代全民守法习惯养成的科学规律,定期举办各种线上线下海洋法治活动,带动公众提高海洋法治建设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效果。第二,坚持海洋法治建设中的“两个结合”。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是海洋文化和法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航”^[9];又实行“第二个结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弘扬民族自信精神、文化自信精神,发掘中国古代的法治文化传统,“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10]。第三,坚持海洋法治建设中基于自主的借鉴。注意借鉴其他国家海洋法治建设的智慧结晶和成功经验,坚持自主基础上的创新实践借鉴。海洋权力与海洋法治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很多国家的海洋法治史均能证明这一点。例如,美国的海洋法律制度较为丰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国会于1865年通过的《鸟粪岛法》本意是为了获取无主小海岛上的鸟粪资源,却同时使得美国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海洋领土,而且引发了英国、法国等世界强国的海权争夺与海法发展。正是由于我国近年来非常注意在海洋权益保护中加强法治建设,使我国在海洋维权中才能更加有法可依、游刃有余。

(五)完善“AI+”赋能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机制在数字化程度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应当加强

“AI(人工智能)+”的海洋法治宣传普及工作。包括: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在数字化时代建设完善海洋法治网络平台,为推动海洋法治建设提供“新基建”支持,遵循数字时代全民守法习惯养成的科学规律,定期举办各种线上线下海洋法治活动,带动公众提高海洋法治建设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效果等。海权海防宣传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从东边来看,我国背靠高原大陆面向茫茫大海;从近代来看,海洋是我国国土防御的重中之重;从新时代来看,海洋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从近海防御来看,我国的海界在哪里,海权也就在哪里;从渔业发展来看,渔权也就是海权。海权与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海权的维护当然需要海洋法治文化的保障,另一方面海洋法治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国家对海权的重视程度和实践状况。在AI(人工智能)时代,海洋法律知识的普及、海洋法治(包括但不限于海权保护和海权行使)意识的培养,都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做到“AI(人工智能)+”:例如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宣传海洋法律制度体系;展示海洋法治实践成果;增强人们对海洋法治文化的情感认同;利用AR(虚拟现实)技术展示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态发展;利用AI(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分析国际海洋冲突风险等。

(六)完善“AI+”驱动的海洋人才培养机制

第一,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归根到底要靠海洋法治人才来完成,AI(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法治人才建设可谓大有可为。传统的海洋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很难为学生创造沉浸式的学习和体验环境,而自从有了AI(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海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从此就重新构建了海洋法律知识图谱;增加了海洋法治智能问答程序模型、AR(虚拟现实)案例分析呈现模式、智能化法律诊所训练系统等新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方法;增加了海洋法治人才培养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便利。第二,应当建立健全AI(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复合型人才能力矩阵,增加数字化技术赋能模块,“产学研协同”培养精通“数字化素养+涉外法治+海洋科学+外国语言+区域国别学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高涉外海洋法治人才的跨境法律问题处置能力、参与全球海洋法律治理的能力,为我国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参与全球海洋法律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使未来的涉外海洋法

制人才成为熟练掌握海洋国际法和我国涉外海洋法制体系,能够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海洋资源开发等国家利益的法律卫士。第三,新型的海洋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对其所带来的挑战的正确认识和及时的对策供给。

“以问题为中心”,从思想高度、认识角度、价值尺度、经验厚度、问题精度、创新维度“六度”方面,论述了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价值尺度、科学经验、问题挑战、建设路径和长效机制。在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内涵和目标维度、以适应理念和“动态系统理论”推动完善海洋法治建设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由于海洋法治的专业性较强,对某些内地省份的人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距离感,因此这方面的普法宣传难度较大、亟待加强。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应当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其实践价值,以适应理念和动态系统理论推动在海洋法治文化建设中守正创新,推进海洋法治文化管理长效机制的完善,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我国海洋权益。

参考文献:

- [1] 盛清才.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中国海洋社会科学研究,2013(00).
- [2] 王慧荣.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述评[J/OL].[2024-11-15].理论建设,1-9.
- [3] 宛枫.直击第十四届中国法学家论坛 这是来自“法治”前沿的声音[J].人民法治,2019(20).
- [4] 郎芳.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进路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为切入点[J].现代经济信息,2018(15).
- [5]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1).
- [6] 罗国强,魏寒冰.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J].中国海商法研究,2024(2).
- [7] 黄文艺.涉外法治范畴的结构论诠释[J].比较法研究,2024(6).
- [8] 雅因.从帕累托改进角度简析我国改革开放40年[J].新西部,2019(33).
- [9] 朱珂,王建明,吴雅欣,等.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底层逻辑与发展路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4(10).
- [10]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1).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of Maritime Rule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GUO Xuewen

Yingke Law School,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as brought new and more urgent needs, more uncertainties and greater challenges to 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maritime rule of law, and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territory” of the ocea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untry, the governance of the sea by a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s an inherent par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Centered around the Six-Dimension framework (ideological height,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 value measure, experience thickness, problem precision, and innovation dimens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experience reference and AI empowerment, implementation pathwa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of maritim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maritime rule of law;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责任编辑 陇 右)